

「抗日戰爭史系列專題演講」 紀要：段瑞聰、 曾銳生

鄭巧君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抗日戰爭史系列專題演講」是國史館自民國 102 年啟動抗戰史編撰計畫以來，所舉辦的系列學術活動之一。今（103）年 9 月，先後邀請日本慶應義塾大學商學部段瑞聰教授及英國諾丁漢大學當代中國研究所所長曾銳生教授蒞館演講。

段瑞聰：盧溝橋事件與中日戰爭之全面展開——以《蔣介石日記》為線索

段瑞聰教授首先說明演講題目使用「盧溝橋事件」而非「盧溝橋事變」，乃因其認為重點不在誰開了第一槍，而是事後引發中國的全面抗戰才是焦點，因而應稱為盧溝橋事件。過去對盧溝橋事件的研究雖多，但缺乏宏觀視角，因此他主張以「革命史觀」重新理解中日戰爭。依據蔣在 1933 年廬山軍官訓練團開學典禮上的演說及 1952 年國民黨七全大會發表的〈反共抗俄基本論〉，蔣把「國民革命」分為三期：第一期是 1911-1928 年，黃埔軍校的成立奠定該期的基礎；第二期是 1928-1945 年，這個階段是蔣在 1933 年提出，預告抗戰將於 1945 年結束；第三期是 1949 年政府遷臺之後，而〈反共抗俄基本論〉成為蔣第三期理論的標誌。中日戰爭是蔣所領導的第二期國民革命過程中的重大事件，若從這個角度來看，那麼爭論「八年抗戰」或自九一八事變起算的「十五年戰爭」的意義並不大。就事實

而言，1931-1937年間並非一直處於戰爭狀態，盧溝橋事件後中國才全面抗戰，因此使用「八年抗戰」較切合史實。

接著，段教授以蔣介石日記及其所提出之「革命史觀」來剖析「盧溝橋事件」與中日戰爭。從蔣的日記裡可看出蔣的革命對象主要是軍閥、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進而扶助弱小民族獨立。其革命理念是繼承自孫中山，但兩人對共產黨的認識和處理方式不盡相同，例如蔣認為國共可合作，但領導權不可交到對方手上。這些都是理解蔣對盧溝橋事件及中日戰爭的基本脈絡。

蔣於1927年訪問日本，與田中義一首相會談，認為日本對中國有以下的誤解：一、以為中國革命成功，其東亞地位動搖，尤其不能確保滿蒙權利；二、中國南北分裂，可以從中操縱；三、利用無智軍閥壓制民眾，彼之政治家遠不如俄矣。中日關



段瑞聰教授（攝影／林正慧）

係的重要轉折點是1928年5月8日的濟南慘案，蔣的日記自隔日（9日）起，出現「恥」、「雪恥」並使用「倭軍」、「倭寇」等字。直至1972年為止，「雪恥」仍是蔣日記的開頭。對於日本的侵略，蔣認為應分開看待軍閥與日本民眾的態度，此係「戰爭責任二分論」。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11月國民黨四大大會即提出「國家建設初步方案」，開始國家總動員之準備，並進行「安內攘外」政策。1933年因日、滿勢力的擴張而導致長城戰役（又稱熱河作戰），增強了蔣的危機意識；1935年的華北危機，促使蔣在是年11月國民黨五大大會中發表演講，確定「最後關頭」方針。1936年4月17日，廣田內閣決定增派「支那駐屯兵」，此係盧溝橋事件的遠因；然而蔣認為中國尚未準備好要與日本全面作戰。該年年底西安事變的影響，使蔣的聲望大為提高，並促成第二次國共合作。至1937年上半年，日本外相佐藤尚武雖提出「日本與中國在平等的立場上調整邦交，極力避免武力衝突」的方針，但中日之間並沒有因此而減少衝突。7月7日盧溝橋事件爆發，中日雙方確定失去和解的機會，因此蔣發表「最後的關頭」的演說，正式宣告全面抗戰。是年12月11日，蔣在日記中記下「此次抗戰即使全國被敵占領，只可視為革命第二期一時之失敗，而不能視為國家被敵征服，更不能視為滅亡也。」同時，也對戰爭擴大進行反思，認為「如當時密允宋哲元准倭築津石

路，則至少可有一年時間之展緩，準備亦較完密」。

對於中日戰爭，段教授認為是蔣介石為完成中國革命所作出的選擇，屬於被動的迎戰，如果考慮蘇聯因素的話，這顯然是一場不得已而為之的戰爭。中日戰爭使中、日之間及東亞地區永久和平的理念破滅，且為中日雙方留下互相憎惡之負面印象。戰後蔣介石的「以德報怨」及雇用白團等，皆是希望與日本化敵為友。另外，蔣介石在戰後施行第三期國民革命，革命的對象是反共抗俄，卻要求美國援助，其反帝、依帝的主張及舉措，實互相矛盾。

曾銳生：蔣介石、西安事變與中日全面戰爭的起點

曾銳生教授指出西安事變的研究成果豐碩，結論卻不盡相同，有的學者認為西安事變是共產黨主導的，也有學者認為西安事變促使蔣介石決定抗日。曾教授根據蔣介石日記、總統文件及宋子文檔案，重新詮釋西安事變。西安事變之前，蔣已隱約知道有事情要發生，1936年12月4日仍和張學良自洛陽赴西安，希望東北軍和西北軍一起剿共。9日，西安各校學生舉行「一二九」運動一週年遊行示威，蔣擔心請願隊伍將前來臨潼，下令必要時可動用武力驅散學生。張學良得知後，為避免學生運動影響其計畫，乃勸阻學生團體遊行示威，並承諾在一週內提



曾銳生教授（攝影／黃翔瑜）

出答覆。當晚張學良勸蔣停止剿共，但遭蔣申斥，因此決定採取行動，於12月12日凌晨發動西安事變。

張學良和楊虎城雖然一同參與西安事變，但兩人的關係並不好。該事變主要由張學良的侍衛隊捉蔣，楊虎城則負責西安的治安，其用意在於，若事變失敗了，西北軍的責任較少。另外，沒有證據顯示蘇聯和共產黨事先知情。蔣剛被抓時，以為蘇聯和共產黨是事變的規劃者，不知道西北軍也有參與，直到看見擔任警衛的都是西北軍，才知道楊虎城也是主事者之一。事變當天，毛澤東即向莫斯科發出電報，三天後才得到回覆，但蘇聯的指示很模糊，因此12月19日再向莫斯科請求指示。蘇聯基本上是不支持事變的，因為史達林認為只有蔣有能力領導中國抗日，當蔣牽制住日本，蘇聯才能避免同時對德、日作戰，因此並不樂見西安事變

的發生，莫斯科的《真理報》社論便抨擊張學良等人的軍事叛變。

蔣被張學良囚禁後，態度堅決、不願意見任何人、也不願意談判。張學良原就無意殺蔣，為了蔣的安全，乃撤換西北軍的警衛，改由東北軍負責。雖然蔣不願意見面和談判，但在周恩來的堅持下，兩人終於在12月24日會面，周恩來告訴蔣：「蔣經國要回來了。」這句話對蔣產生了影響力。1935年蘇聯曾要求以牛蘭交換蔣經國，但當時中國以為牛蘭是蘇聯的重要情報人員，因此未予答應。西安事變時，周恩來告訴蔣介石：「蔣經國要回來了。」但並未多作解釋，讓蔣自行揣測。蔣認為蘇聯願意讓蔣經國回來，意指會提供軍事援助。周恩來除向蔣傳達訊息外，在其他事情上也有很大的功勞，例如周恩來成功化解楊虎城和張學良之間的矛盾。又根據宋子文的紀錄，周恩來向蔣表示，過去一年裡共產黨希望可以停止內戰，更希望國共可以聯合抗日，同時也爭取共產黨在南京政府裡能有發言的機會。蔣回覆，只要共黨不破壞國家統一，並接受中央政府的命令，成為國家軍隊的一部分，就讓共黨加入。

曾教授認為西安事變對蔣是有影響的，但不能因此推論是因為西安事變才使蔣決定抗日，因為蔣本來就有抗日的計畫，西安事變使得國共有機會談合作，條件是蘇聯會軍援中國。另外，曾教授認為將西安事變、盧溝橋事變和中日抗戰串連起來是有問

題的，因為三者並沒有必然的因果關係。蔣因為西安事變對蘇聯有不同的理解後，對抗日的處理也就不同，蔣和蘇聯曾有多次的談判，只是蔣一直不信任蘇聯，直到西安事變發生，蘇聯透過周恩來傳話，蔣才認為蘇聯真的會幫助中國，才答應國共合作。

最後，曾教授指出中日全面戰爭不是由日本，而是由蔣介石啟動的。日本雖於1937年7月7日在北平城外採取挑釁行動，但並不是因為盧溝橋事變才使蔣決定要抗日。聯合戰線也是在同年8月蔣派出部隊攻打上海日軍後才形成的，淞滬會戰是一次世界大戰後最大規模的陸戰。蔣決定全面抗戰不是因為他在西安事變後與中共達成聯合抗日的協議，而是在西安收到史達林的訊息，認為蘇聯暗示會支持對日作戰，蔣判讀史達林的心意後，才決定與中共合作。在八年抗戰的前四年，蘇聯確實是支援中國武器的最大供應者。

小結

段、曾兩位教授皆引用《蔣介石日記》來重新解讀中日戰爭的爆發，然而從不同的角度出發，導致兩人的結論不盡相同。段教授認為中國是被動迎戰，曾教授則持相反意見。雖然歷史的解釋呈現多樣化，但重點仍在於如何看待戰爭所造成的影響，以及能做哪些補償，並且記取歷史的教訓，不讓殘酷的事情再次發生。